

广西师范学院博士点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黄毅 著

社会变迁与文化重构

以《阿诗玛》为个案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黄毅
著

社会变迁与文化重构

以《阿诗玛》为个案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变迁与文化重构:以《阿诗玛》为个案 / 黄毅著. —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130-4904-7

I. ①社… II. ①黄… III. ①彝族—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②彝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9948号

内容提要

1949年前,彝族撒尼支系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作为撒尼社会民间习惯法的一部分被建构起来,并在撒尼社会广泛传播。1949年后,《阿诗玛》经历了两次大的重构,第一次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文艺工作者的搜集整理,第二次则源于改革开放时期撒尼社会发展旅游业。《阿诗玛》在1949年后的传承经历表明,文化生态的变迁势必导致文化的变迁,重构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的一种基本形式。本书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资料丰富,思路清晰,语言生动,适合人类学、民族学专业,尤其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的学者、研究生、大学生阅读和参考。

责任编辑:李瑾

责任出版:刘译文

社会变迁与文化重构
以《阿诗玛》为个案
黄毅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55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92	责编邮箱: lijin.cn@163.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40千字	定 价: 45.00元

ISBN 978-7-5130-4904-7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PREFACE



序

《阿诗玛》是居住在云南的彝族撒尼人的口头传唱故事，广泛流传于1949年以前的撒尼社会。撒尼人凡遇有婚丧嫁娶，或其他重大活动，都喜欢唱《阿诗玛》。《阿诗玛》的故事主干是阿诗玛的出生、成长及婚恋生活，但因传唱者的不同，故事的情节乃至人物形象、性格都有很大差异。演唱《阿诗玛》的曲调也非常多，有“喜调”“老人调”“悲调”“哭调”“骂调”等。女子成人了，唱“绣花调”；女子出嫁了，唱“苦嫁调”。青年人在“公房”唱，老年人在火塘边唱，毕摩在祭祀时唱，壮年人在田间劳作时唱。《阿诗玛》包括了撒尼人生活劳作、习俗礼仪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撒尼社会的百科全书。对于喜爱歌唱的撒尼人来说，《阿诗玛》伴随他们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初起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党和政府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下乡收集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于是《阿诗玛》这部口承文化作品被党和政府派遣的文化工作者所收集整理，加上翻译过程中的创造，舍弃了其歌唱曲调，变成一部用汉语表达的叙事长诗。整理翻译创作完成的作品公开出版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评论、研究的文章陆续不断地发表。到60年代，叙事长诗又被改编为电影。扮演女主角阿诗玛的杨丽坤，此前已经在电影《五朵金花》中饰演白族女主角而深受观众喜爱，阿诗玛因其靓丽的银幕形象和富有神话浪漫色彩的故事情节令全国的电影观众倾倒，阿诗玛成为彝族人民的代表形象，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但很

快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这部电影连同它的主演者一起遭遇了厄运。改革开放后，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大批被封存的“毒草”重见天日，昔日被视为“封、资、修”的电影、小说、戏剧、歌曲、舞蹈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电影《阿诗玛》也得以重新放映，观众纷纷涌进影院，追寻过去的记忆。彝族姑娘阿诗玛再次唤起人们的记忆。

改革开放使中国在长期的自我封闭后面向世界，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进程。全球化不仅带来商品、资本、技术、人员、符号的全球性流动，而且带来地方意识、民族意识的增强。文化符号、民族符号成为地方与民族群体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价值的重要手段。阿诗玛，这个具有地方民族符号意义的形象，伴随着云南的旅游宣传片、特色商品广告、彝族刺绣等旅游纪念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次与阿诗玛一起走向全国和世界的，还有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石林、火把节、大三弦、左脚舞等彝族文化符号。而阿诗玛，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丽、勤劳、富于反抗和斗争精神的形象，转向更具有亲和性和人情化。推动这次阿诗玛的形象重塑的，除了地方政府外，资本、商家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更不可忽视的是彝族群众自身对阿诗玛的重新认同与创造。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在阿诗玛形象的重构中他们还基本处于被动状态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新的重构他们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石林地区身着改良过的彝族撒尼人服装（这也是电影中的阿诗玛的服装）的导游少女就生动地表演和诠释着阿诗玛的形象。与此相仿的例子，还有云南大理白族的“金花”。这其中蕴含着时代和社会的文化变迁，颇为值得探讨。

此前对阿诗玛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最早开始的从文艺理论视角对长诗《阿诗玛》的研究，民间文学挖掘整理的视角，到民俗学的视角直至后来的文化学视角、传播学视角等，中外学者已对其做出了种种的解说。作者再选取这一题目写下这本书，有什么新的突破？我想，重点就在于作者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民族文化的建构与重构，来重新审视作为彝族撒尼人符号的阿诗玛是怎样形成并被表达出来的。

民族文化是民族群体的标志，一个民族群体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群体相区别。但这个文化并非从来就有或一成不变，民族文化在历史的发

展变化中产生形成,与民族群体自身的产生发展同步。换言之,民族文化是在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生成,或者说被不断建构起来的。从民族文化本身来看,民族文化的形成又依托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简称“生境”)。文化生境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构成,还包括特定社会群体的历史积淀。民族文化的建构没有完成时,特别是在文化生境发生大的改变时,民族文化的建构会脱离原有的方向,某些原有的性质发生变化,形成具有新的特质的民族文化。这一过程也可称为民族文化的重构。本书就聚焦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深入梳理其传统不断被解构和重新创造的过程,并力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传播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重构”的规律。作者的创新之处是:

一、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较为深入细致,同时能结合对当事者的访谈,使《阿诗玛》这一文本的变化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呈现;

二、依据文化生态学和建构主义的理论,提出《阿诗玛》在当代的两次重构,着重分析了两次重构的不同文化生境,两次重构的不同主体和驱动力,从而使两次重构呈现出不同的结果;

三、把重构作为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传承发展的基本形态,并对之做了初步的理论说明。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本书还存在着一些遗憾。由于资料的缺乏,对阿诗玛这一文化符号的建构研究还比较简单,对其重构过程的复杂性也还可再深入等,但这并不抹杀本书已取得的成绩。任何学术问题都没有止境,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有更大的作为。

是为序。

施惟达

2016年11月于云南大学东陆书院

(施惟达: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问题的缘起	1
二、研究的现状	2
三、概念界定	15
四、研究意义	21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22
六、研究样例的选定	23
第二章 在现实情境中建构的文化	25
一、现实的需要与文化建构的发生	25
二、传统文化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	36
三、现实情境对文化建构的影响	37
第三章 一次由政治主导的文化重构	57
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	57
二、由政治主导的一次搜集	59
三、由政治主导的整理	68
四、意识形态的变迁与撒尼人的选择	75

第四章 旅游开发与文化重构	113
一、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文化重构的发生	113
二、由旅游经济推动的文化重构	125
三、撒尼人对重构的接受	133
第五章 结语：当代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重构中传承	143
一、重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承的基本方式	143
二、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与当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构的发生	146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创造与传承	154
四、《阿诗玛》的未来	156
参考文献	173
附录：田野手记	185
后记	213

第一章 绪 论

一、问题的缘起

《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一部叙事长诗。尽管我的家乡广西与云南毗邻，但我原本对《阿诗玛》的了解并不多。仅有的认识，一是我还在读初中时听到的电影《阿诗玛》里的那首著名的《马铃儿响来玉鸟唱》。那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广西东部的一个小县城里上初中。那时能听到的歌曲非常有限，因而少数的几首歌曲总是被反反复复地播放，以致后来虽然没人教，我已经基本上能哼下来了。二是我在一种香烟的盒子上看到的阿诗玛的头像和“阿诗玛”三个字，从此知道，阿诗玛是个少数民族姑娘。三是上大学后，在大学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翻看了《阿诗玛》，大致地了解了这个故事。那时我对《阿诗玛》的印象也仅限于此，客观地说，应该是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那时，作为广西人，我们为之疯狂的是《刘三姐》。后来到了云南工作，在云南感受到了与广西完全不一样的看待《阿诗玛》的氛围。在云南，人们不仅普遍熟悉《阿诗玛》，喜欢《阿诗玛》，还以《阿诗玛》为骄傲。更让我惊奇的是，《阿诗玛》的故乡离我所在的昆明竟这么近，我周边竟然就有不少撒尼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想要去深入地了解这部撒尼人的叙事长诗。

一般认为，《阿诗玛》产生于明朝中后期。此后，在撒尼人中世代相传。20世纪50年代，一批文化人深入撒尼人居住区，在搜集到二十多种民间口头流传的异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然后以《阿诗玛》为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引起轰动，《阿诗玛》从此享誉天下。之后，《阿诗玛》又出了单行本，还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从此，《阿诗玛》更是变得家喻户晓。



但另一方面,时至今日,尽管撒尼人依然自豪地声称《阿诗玛》是他们的《阿诗玛》,还特别强调他们的每个姑娘都是阿诗玛,每个小伙子都是阿黑,然而,随着撒尼社会的变迁,《阿诗玛》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中,大的变化至少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第二次发生在80年代,这时正是整个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阿诗玛》发生变化?《阿诗玛》如何变化?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言,这种变化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让我最终选择了这项研究。

二、研究的现状

1954年2月20日,《云南日报》“文艺生活”栏目发表杨知勇的文章《撒尼叙事诗〈阿诗玛〉整理经过》,这是《阿诗玛》研究的开始。这篇文章的发表到现在,已过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间,《阿诗玛》的研究走过了从文学、民间文学到文化的研究之路,显示出《阿诗玛》的研究正一步步走向深入。

(一)文学视角下的《阿诗玛》研究

1954年1月末到2月初,《云南日报》发表了黄铁等人搜集整理的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文艺界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久,多家刊物、出版社又或转载或出版了这部作品,《阿诗玛》研究也由此而拉开了序幕。当然,这种研究主要是针对整理本《阿诗玛》的。

对整理本《阿诗玛》的研究,首先是对搜集整理工作所进行的研究和评价。

黄铁等搜集整理者在《〈阿诗玛〉第一次整理本序言》等多篇文章中介绍了《阿诗玛》的搜集、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情况,这些介绍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他们除了肯定搜集整理工作取得的成绩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孙剑冰在《〈阿诗玛〉试论》^①一文中就指出:整理人往往用个人的创作代

^① 孙剑冰:《〈阿诗玛〉试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集刊》(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替对原作的恢复。即整理人将不少汉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人情楔进原作,代替了反映在作品中的撒尼人民的社会生活;用近代化的个人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代替了原作的表现方法,甚至还不管撒尼人民乐意不乐意,将自己熟悉的那一套四行诗的形式强加在《阿诗玛》身上。李广田在《〈阿诗玛〉序》^①中也认为,黄铁等人整理的《阿诗玛》少了点撒尼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艺术特色,多了点非撒尼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味道。为此,李广田对整理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一是对原材料不能随便添补,要尽量忠实于原作。二是要对原作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三是要保持原作的风格。此外,不要把汉族的东西强加到兄弟民族的创作上;不要把知识分子的东西强加到劳动人民的创作上;不要把现代化的东西强加到过去的事物上;不要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事物去代替、破坏民族民间创作中那些特殊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方法;等等。

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继续对《阿诗玛》的搜集整理进行研究。罗希吾戈在《〈阿诗玛〉翻译和整理的几点浅见》^②一文中认为黄铁等人的“总和”的整理方法并不妥当。王明贵也认为,因《阿诗玛》的整理者不是彝族人,不懂彝族语言,因而在整理时丢掉了一些彝语中所特有的修辞格,从而损害了《阿诗玛》的民族风格。此外,整理者对《阿诗玛》主题的处理方法也值得商榷。^③

对《阿诗玛》搜集整理工作的研究和评价,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热点。学者们对这一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认为它不够尊重原作。但仔细地研究也会发现,前后的批评也还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前期的批评承认整理者新编的权力,而后期的批评者基本不承认这种新编的权力。这种差别体现了人们对《阿诗玛》认识的变化,也体现了研究的外部环境的变化。

其次是对《阿诗玛》的人物形象的研究。

臧克家的《撒尼人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最早对《阿诗玛》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阿诗玛与阿黑这两个人物形象塑造得很成功,同时

① 李广田:《〈阿诗玛〉序》,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阿诗玛——彝族民间叙事诗》,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② 罗希吾戈:《〈阿诗玛〉翻译和整理的几点浅见》,《山茶》1982年第2期。

③ 王明贵:《〈阿诗玛〉三论》,《贵州彝学》1989年创刊号。



对这两个人物形象也进行了概括：阿诗玛“有着动人的外貌，有着爱劳动、爱自由、爱穷苦伙伴的美德，有着灵巧的一双手和响亮的歌喉，更有着优美的内心和性格以及对于生活爱情的高尚理想的追求……”阿黑“他勤劳，然而生活得快乐，他勇敢，然而富有智慧，这样一个‘断得弯不得’的性格，正是劳动人民性格的典型化”。^①刊登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7期的段平等人撰写的《优美的歌——〈阿诗玛〉读后感三则》也肯定了阿诗玛和阿黑是两个“美丽可爱的人物形象”，阿诗玛“坚强、勇敢、美丽、可爱”，阿黑“机智勇敢”。^②晓雪的《〈阿诗玛〉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一文写于1978年，文章较高地评价了《阿诗玛》的人物塑造：阿诗玛与阿黑是两个“比较完美的艺术典型”。^③此外，陶学良^④、郭思九^⑤等也都对阿诗玛和阿黑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且都给予了肯定。由于阿诗玛与阿黑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比较单纯而突出，因而这方面的争议不多。

最后是对《阿诗玛》的主题与艺术特色的研究。

关于《阿诗玛》的主题，整理者在整理时就已经明确了，是“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婚姻掠夺，争取自由幸福”^⑥，或者“歌颂了勤劳、勇敢、自由和爱情，歌颂了撒尼人民的高尚品质和面对压迫者英勇不屈的斗争”^⑦。雪蕾^⑧、陶学良等肯定了《阿诗玛》的主题。陶学良还认为，“主题鲜明，战斗性强的《阿诗玛》，它在云南的廿二个少数民族中是不可多得的。”^⑨但王明贵不认同，他说：“‘把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婚姻掠夺和争取自由幸福’作为《阿诗玛》的主题，从而

① 臧克家：《撒尼人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文艺学习》1954年第4期。

② 《优美的歌——〈阿诗玛〉读后感三则》，《人民文学》1954年第7期。

③ 晓雪：《〈阿诗玛〉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边疆文艺》1978年第8期。

④ 陶学良：《茶花一树早桃红》，陶学良：《彝族文学杂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270页。

⑤ 郭思九：《论彝族叙事诗〈阿诗玛〉》，赵德光：《阿诗玛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页。

⑥ 黄铁等：《〈阿诗玛〉第二次整理本序言》，《民间文学》1996年第3期。

⑦ 黄铁：《〈阿诗玛〉——“我们民族的歌”》，赵德光：《阿诗玛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⑧ 雪蕾：《读〈阿诗玛〉的一些体会》，《西南文艺》1954年9月号。

⑨ 陶学良：《茶花一树早桃红》，陶学良：《彝族文学杂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267页。

排除了其他主题,并因此而删除了大量反映彝族社会历史风俗特征的材料。这样是否是科学的整理方法,值得怀疑。因为民间文学作品具有其本身的特点而不同于文人创作,即使是文人创作也不完全是主题单一的,更何况作为民间长诗的《阿诗玛》原作中主题具有多样性,而不仅仅有‘把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婚姻掠夺和争取自由幸福’这一主题。”^①很显然,王明贵是从民间文学的立场来对《阿诗玛》的主题处理提出批评的。

对于《阿诗玛》的艺术特色,学者们也做了深入的分析。臧克家认为,《阿诗玛》“全诗像一座生活的大花园,充满了缤纷的色彩和扑鼻的香气”。此外,它还“有着一般民歌的特点:生活气息浓重,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朵形象化的花。而这些形象又都是来自亲切的生活经验”。^②雪蕾则认为,《阿诗玛》“充满着强烈的浪漫的、传奇的色彩”,“富有传奇意味”。^③晓雪认为,《阿诗玛》的艺术特色,首先是它的语言的朴素美和单纯美。其次是丰富精彩、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尤其是比、兴两种手法。此外就是它的诗句的回环的美。^④陶学良也认为《阿诗玛》的艺术特色很鲜明,这些特色包括:一是善于布置适合开展人物活动的背景、气氛。二是布局巧妙,有起有伏。三是善于采用比喻、对比、排比等多种艺术手法烘托人物形象。^⑤王明贵则认为,长诗《阿诗玛》在结构上有一个特点:一是总体结构线索单一,明白清晰,首尾完整,没有纷繁复杂的头绪,也没有几条线索并行的复式结构。二是局部结构的“蒙太奇”式艺术效果,而且这是《阿诗玛》所独有的。^⑥《阿诗玛》整理本的撒尼特色是鲜明的,学者们的研究较充分地揭示了《阿诗玛》在艺术上的特点。

(二)民间文学视角的《阿诗玛》研究

尽管经过整理,《阿诗玛》毕竟还是撒尼人的民间叙事长诗,这一点,就连

① 王明贵:《〈阿诗玛〉三论》,《贵州彝学》1989年创刊号。

② 臧克家:《撒尼人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文艺学习》1954年第4期。

③ 雪蕾:《读〈阿诗玛〉的一些体会》,《西南文艺》1954年9月号。

④ 晓雪:《〈阿诗玛〉的人物形象和艺术魅力》,《边疆文艺》1978年第8期。

⑤ 陶学良:《茶花一树早桃红》,陶学良:《彝族文学杂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295页。

⑥ 王明贵:《〈阿诗玛〉三论》,《贵州彝学》1989年创刊号。



整理者也不否认,因此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阿诗玛》是很自然的。当然,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阿诗玛》,研究者一般就不再仅仅从整理本《阿诗玛》出发来研究了,他们大多结合在民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阿诗玛》来对长诗进行研究。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研究《阿诗玛》,人们主要关注了如下问题。

1. 《阿诗玛》产生于何时?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阿诗玛》形成的年代非常久远,如孙剑冰根据撒尼人“阿诗玛是撒尼人中第一个出嫁的姑娘”的说法,认为《阿诗玛》的历史背景应为原始公社解体期。^①傅光宇从《阿诗玛》的内容——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从《阿诗玛》的艺术特色——阿诗玛的形象具有传奇色彩,阿黑的形象是一个史诗式英雄形象的雏形,长诗对创世史诗成分的挪用,长诗质朴、雄浑、单纯、优美的艺术风格等,以及从撒尼人的历史等方面证明,《阿诗玛》十分古老,应产生于彝族“六祖分支”前的父系制阶段。^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阿诗玛》的产生应是比较晚近的事。如杨知勇认为《阿诗玛》产生于封建社会,理由是圭山区很早就具备了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而据老人回忆,《阿诗玛》约产生于一百年前。^③陶学良根据撒尼人的历史、长诗中反映的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热布巴拉的失势提出《阿诗玛》的形成约在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④谢国先则提出,阿诗玛故事的主题是对兄妹二人的乱伦欲望的暴露和惩罚,这样,要研究阿诗玛故事产生的时代就变得很困难,因为只要人类生活的群体所包括的人口数量超过兄妹二人,阿诗玛的故事就可能产生并流传。但从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如以竹管喝酒,作品中出现

① 孙剑冰:《〈阿诗玛〉试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集刊》(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傅光宇:《〈阿诗玛〉原始成分简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等:《云南民间文艺源流新探》,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③ 杨知勇:《撒尼叙事诗〈阿诗玛〉整理经过》,《云南日报》“文艺生活”栏目1954年2月20日第3版。

④ 陶学良:《茶花一树早桃红》,陶学良:《彝族文学杂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74页。

玉米、广西府等用语可以推断,阿诗玛故事开始流行的时代是明代中后期。^①李德君则提出,《阿诗玛》应是撒尼人进入封建时代以后的作品。原因是:“要是《阿诗玛》果真是在撒尼人的祖先与其他支系的彝人的祖先共居在一起的年代就已产生,那么,如此具有魅力的作品,就一定会在共同生活的彝族中传播开,并在后来的迁徙中被带到各地,哪怕是只带到一部分地区。可是,现实的情形却是,在别的彝族支系当中都不见流传。”^②乌谷依据《阿诗玛》中提到的阿黑射箭,兹莫当媒人的细节,断定“《阿诗玛》所产生的时代,可追溯到‘南诏’时期,并延续到‘改土归流’的近现代”。^③毕志光也根据《阿诗玛》中的细节来提出自己对《阿诗玛》产生年代的看法:《阿诗玛》的产生年代为公元1106年左右。^④刘世生应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对《阿诗玛》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提出:“《阿诗玛》叙述的历史事件应该发生在明朝政府在成化年间实行‘改土设流’政策之前,而《阿诗玛》叙事长诗应形成于‘改土设流’之后。”具体地说,《阿诗玛》形成于1481年。^⑤

民间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变异性,《阿诗玛》的形成,应该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有一个故事的核,然后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断地叠加新的内容。这样就能解释《阿诗玛》既有非常古老的内容,但从细节上来判断似乎又只是在晚近才形成的矛盾。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两种观点应该说都有局限性。

2. 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

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问题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从原始资料出发,尽管有点儿怀疑,但一般都认为他们是亲兄妹关系。如杨知勇说,他们在整理之初,就

① 谢国先:《阿诗玛新论》,《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② 李德君:《关于〈阿诗玛〉产生年代的思考》,赵德光:《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③ 乌谷:《〈阿诗玛〉之我见》,赵德光:《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④ 毕志光:《试论〈阿诗玛〉中的地名词释义》,赵德光:《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23页。

⑤ 刘世生:《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赵德光:《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疑虑他们是恋人关系,但最终不得不认同他们是兄妹关系,因为从所有的传说中都找不到他们是恋人的根据,而撒尼人又一致肯定他们是兄妹关系。而且兄妹关系又与撒尼人现在还保存着的一些观点和习惯联系得非常密切。如现在撒尼人中还有“舅舅为大”的说法,据说就是由《阿诗玛》故事中阿黑战胜了热布巴拉家的传说得来的。^①孙剑冰也认为阿诗玛与阿黑是兄妹关系,他说:“如果阿黑与阿诗玛不是兄妹关系,现有原作品中肯定的阿黑的‘舅舅’身份是哪来的呢?‘舅舅为大’与阿黑结合得这样紧,在作品中有这么大的作用,又怎样解释呢?不能否认,多份‘异文’中的‘舅舅为大’(思想、人物、情节)对于阿黑与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是个很好的说明。”^②李缙绪也赞同阿诗玛与阿黑是兄妹的说法,他认为,首先,原来搜集到的二十份原始资料都把阿诗玛和阿黑作为兄妹关系来表现。唯有资料“六”中有“黄金十五两,郎来赎妹身”这样两句诗,但从全篇看,这个“郎”字显然是“哥”字的误写。其次,1958年以来所搜集的九种《阿诗玛》作品中,不论是古彝文本还是口头流传本,阿诗玛和阿黑也都是兄妹关系。因此,他们是兄妹关系无疑。^③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阿诗玛与阿黑是情人关系。如公刘就是这样主张的。他的理由是:“兄妹关系也的确又有值得怀疑的地方,譬如吹奏口弦一事,这就有点出乎常规。大家都知道,在云南的数十种兄弟民族中,以口弦作为男女传情的工具的,总要占据半数以上,包括撒尼人本身在内。”^④后来,公刘又去圭山住了一个半月,继续对阿诗玛与阿黑的关系进行考察。这次考察,他有了新的发现,即在圭山地区找到了三种阿诗玛与阿黑是情人关系的传说,以此证明阿诗玛与阿黑是情人关系。^⑤日本学者君岛久子也主张“情人说”。她认为,在民间歌谣中,情人间相互称哥和妹是非常普遍的,《阿诗玛》也不会是例外。此外,

① 杨知勇:《撒尼叙事诗〈阿诗玛〉整理经过》,《云南日报》“文艺生活”栏目1954年2月20日第3版。

② 孙剑冰:《〈阿诗玛〉试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集刊》(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③ 李缙绪:《〈阿诗玛〉原始资料前言》,李缙绪:《阿诗玛原始资料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④ 公刘:《〈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⑤ 公刘:《有关〈阿诗玛〉的新材料》,《民间文学》1955年5月号。

“在所有的原始资料中，没有一篇讲述阿黑的出生情况，并且，阿黑都从中途半道登场说明了这一点”。^①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阿诗玛与阿黑既是兄妹关系，也是情人关系。如毕志峰就提出，阿诗玛与阿黑无论是兄妹关系还是情人关系，都应该允许存在，其理由，首先是民间文学具有变异性，因而就算原来是兄妹关系，后来发展出情人关系，也属正常。其次是撒尼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如“尼都米赛党”，男女青年结婚双方都请老艺人来唱《阿诗玛》等，都把阿诗玛和阿黑看成情人和夫妻，等等。^②谢国先在《阿诗玛新论》一文中则提出，阿诗玛由撒尼洪水神话和兄妹婚神话中的阿诗演变而来，阿黑则由这些神话中的阿鲁演变而来。在撒尼洪水神话和兄妹婚神话中，阿鲁和阿诗既是兄妹，也是夫妻。因此，阿诗玛与阿黑就既是兄妹也是情人。^③

应该说，认为阿诗玛与阿黑是兄妹或是情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但若注意到《阿诗玛》是一个经长期发展、累积形成的民间文学作品的事实，那么，谢国先的观点无疑更令人信服。

3. 阿着底的所在地

《阿诗玛》故事的发生地“阿着底”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阿着底”的所在地，撒尼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现在的大理，因此1954年发表的《阿诗玛》整理本就据此认为阿着底在现在的大理一带。但段尔煜、黄建明认为，阿着底应该在现在的曲靖一带，理由有三：第一，目前的撒尼语中没有“大理”一词，却有称曲靖为“阿着罗玛”的，而“阿着罗玛”就是阿着底；第二，各地彝族古文献《指路经》也都把今天曲靖一带称为“阿着底”；第三，今天的彝族出自古代东爨乌蛮系统，古代东爨乌蛮的活动中心就在今曲靖一

① [日]君岛久子：《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的形成》，《红河民族语文古籍研究》1988年第2期。

② 毕志峰：《〈阿诗玛〉我们民族的歌——试论撒尼叙事长诗〈阿诗玛〉的几个问题》，《路南文史资料选辑》1986年第1辑。

③ 谢国先：《阿诗玛新论》，《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